



性别失衡的 社会风险研究

——基于社会转型背景

The Social Risk Research of Gender Imbalance
—Based On Social Transition Context of China

刘慧君 李树苗 等 /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性别失衡的 社会风险研究

——基于社会转型背景

The Social Risk Research of Gender Imbalance
—Based On Social Transition Context of China

刘慧君 李树茁 等 /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 ACADEMIC PRESS (SSAP)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 出版说明

后期资助项目是国家社科基金设立的一类重要项目，旨在鼓励广大社科研究者潜心治学，支持基础研究多出优秀成果。它是经过严格评审，从接近完成的科研成果中遴选立项的。为扩大后期资助项目的影晌，更好地推动学术发展，促进成果转化，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按照“统一设计、统一标识、统一版式、形成系列”的总体要求，组织出版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成果。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

本书的研究和出版受到以下项目资助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13FRK001）
陕西省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13HQ002）

前 言

性别结构失衡问题早在 20 世纪 90 年代就已经进入了社会人口学家的研究视野。但那时候的研究集中于出生人口性别比，将其视为人口问题，更多地关注中国的出生人口性别结构到底是真偏高还是瞒报导致的假偏高，偏高的出生性别比和女婴死亡率到底导致中国有多少女性人口失踪，出生性别比和女婴死亡率偏高的产生机制是什么，如何通过综合治理使出生性别比恢复正常等问题的研究。西安交通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一直参与其中，致力于对这些问题的解答。经过长期不懈的努力，研究团队在关爱女性、保护弱势群体及综合治理等领域积累了丰富的理论和实践经验，并与美国斯坦福大学人口与资源研究所、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等国际知名大学和研究机构建立长期合作关系，在联合国人口基金、联合国儿童基金、美国福特基金等国际组织的资助下，将对中国弱势群体的合作研究推向国际领域，也通过与国内各级政府部门的密切合作，将研究成果及时转化为政策实践，为国家开展“关爱女孩行动”、综合治理性别失衡问题提供了理论指导和技术支持。李树苗教授作为研究团队的负责人，一直在引领和推动着整个团队的研究方向和进展。

2006 年以来，西安交通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的研究方向发生了一个重大转变，从对出生人口性别结构的关注转向对整个人口性别失衡问题的研究，从对性别结构失衡原因的揭示转向对性别结构失衡后果的探讨。研究视角也不再局限于人口学，开始向社会学、管理学倾斜。与此同时，*Bare Branches: The Security Implications of Asia's Surplus Male Population* 一书的出版，使得“光棍威胁论”一时之间甚嚣尘上。为此，李树苗教授希望本书的第一作者能够解答一个问题：性别失衡的影响是如何从人口领域上升到公共安全领域的？而基于多年来对弱势群体的关注及社会风险的研究积累，刘慧君副教授也迫切希望能够将人口性别结构的失衡问题放在整个经济社会转型的背景下，探讨被婚姻挤压的男性到底是社会风险的受害者

还是施与者，性别失衡引发的社会风险到底是什么，与中国经济社会转型中的社会风险是什么关系。

对于这样一个庞大且重大的研究问题，同时面对非常有限的资料条件和理论可资利用的条件，怀揣一颗惶恐不安的心，在谨慎和犹豫中始终坚持着。幸运的是，有李树苗教授的执着与引导，有朱正威教授（公共安全研究）、果臻博士（人口统计）的加盟，还有西安交通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其他教师、博士生和硕士生在数据资料搜集、数据分析甚至部分研究内容的承担等方面的大力支持。踏着先行者的足迹，经过多年的努力，终于在中国社会转型背景下性别失衡的社会风险、社会风险的传导放大及风险治理方面突破了一个又一个研究问题，积累了一系列研究成果。借助国家社科基金后期的出版资助，我们研究团队的研究想法在此能够得以系统梳理，直面研究同行和其他读者的批评指正，相信这些批评指正会是我们下一步研究的动力和方向。

在本书的撰写中，我们抱着谨慎、开放的心态，力图兼容并蓄，在社会变迁的视野下考察历史与现实的差异与延续，在全球化的形势下探讨国际研究揭示的规律性与中国特定国情下的特殊性，在理论阐释与实证检验并行中，保持研究过程的严谨性和研究结论的信服力。由此，希望我们的研究能够跟国内外研究者对话，也希望我们的研究能够为这个社会的和谐发展留下点什么，不管是认识观念方面的还是政策启示方面的。

本书除绪论外分三篇，共八章主体内容。整体按照总体设计→基础研究→机制研究→对策研究的顺序进行布局，而核心章节按照性别失衡社会风险的识别→性别失衡社会风险的传导放大→风险阻断与治理的思路进行安排。该布局基本展示了整个研究的时间顺序及各阶段研究重心的转变，也反映了研究团队在对性别失衡及其社会风险的研究中由浅入深、由表及里、由理论到实践的不断深入的认识过程。具体章节安排如下。

绪论。主要介绍了研究背景，即在社会转型的背景下进行性别失衡的社会风险研究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并对整个研究中涉及的核心概念、框架思路、数据方法进行了交代。

第一篇，基础研究：性别失衡及其社会风险。本篇首先基于历史和国际的视野，分析当代中国人口性别结构的演变及其驱动因素，并总结分析了性别失衡的社会人口环境下存在的人口健康和公共安全问题；在此基础

上，基于现实调查数据，探索了中国的性别失衡所面临的人口健康和公共安全风险；最后，对性别失衡背景下的社会风险进行了系统的识别和总结。具体内容如下。

第一章是当代中国人口性别结构的演变。主要研究内容包括三部分：①介绍当代中国人口性别结构的主要特征及其演变过程；②梳理和分析人口性别结构的三个驱动因素及其态势；③量化分析影响人口性别结构的各个驱动因素及其在不同时期的交互作用。

第二章是性别失衡下的人口健康与公共安全。主要包括四部分研究内容：①在国际和历史背景下，对性别失衡所可能引发的人口健康与公共安全风险进行系统综述；②基于性别差异的视角，探索婚姻状况、婚姻质量与心理福利的关系，及社会支持所可能发挥的缓冲作用；③检验农村大龄未婚男性及流入城市的大龄未婚男性是否存在更大的性风险；④检验流入城市的大龄未婚男性是否对社会安全具有更大的危害性。

第三章是性别失衡社会风险的系统识别。主要包括三部分内容：①采用历史、国际和现实相结合的视角，综合利用期刊、图书及网络资源，系统识别性别结构失衡的社会环境下可能存在哪些宏观社会风险；②从相关利益者的角度，利用网络新闻案件等二手资料和一手访谈资料，系统识别和总结性别结构失衡背景下的各类相关利益群体及其行为失范特征；③识别宏观层面的社会风险与中微观层面的行为失范之间的内在关系。

第二篇，机制研究：性别失衡社会风险的传导放大。首先揭示性别失衡社会风险的放大机制，然后进一步揭示性别失衡社会风险的传导与突变机制。具体内容如下。

第四章是性别失衡社会风险的放大机制。包括三部分内容：①构建性别结构失衡风险的社会放大理论模型；②阐释中国性别结构失衡风险与社会转型风险在互动中实现社会风险放大的路径和机制；③具体到性风险领域，检验性别失衡下艾滋病性传播风险的放大机制。

第五章是性别失衡社会风险的传导与突变机制。包括四部分内容：①构建一个性别失衡风险传导的贝叶斯网络模型；②揭示性别失衡风险的传导机制；③构建性别失衡背景下社会安全事件的发生过程模型和尖点突变模型；④揭示性别结构失衡的背景下，社会安全事件发生的机理及对社会事件的控制点。

第三篇，对策研究：性别失衡及其社会风险的治理。本部分内容在对性别结构失衡的产生机制及社会风险治理进行理论阐释的基础上，分析了性别失衡议题背后的利益格局和政策博弈过程，探讨了性别失衡的出路问题，并在此基础上系统地提出了性别失衡社会风险治理的措施。具体内容如下。

第六章是性别失衡及其社会风险治理的理论基础。主要包括三部分内容：①对性别失衡的产生机制进行理论阐释；②构建社会变迁背景下性别结构演变的机制模型并揭示中国性别失衡的演化机制；③介绍社会风险治理的基础理论。

第七章是性别失衡议题的讨论与政策博弈。主要包括四部分内容：①分析性别失衡议题背后的多元利益格局；②总结性别失衡议题的政策博弈过程；③基于理论分析探讨性别失衡的出路；④通过总结归纳浙江省的成功经验，介绍一种有效的应对模式。

第八章是性别失衡社会风险的阻断与治理。主要从性别失衡风险的治理、性别失衡社会风险放大途径的阻断两方面探讨对策建议。

本书由李树苗教授和刘慧君副教授总体策划、统筹和设计，并由刘慧君副教授承担主要的研究和统稿工作。朱正威教授承担了第一章第四部分的研究和撰写任务，果臻博士承担了第一章其他部分的研究和撰稿任务。另外，在李树苗教授的协调指导下，西安交通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所靳小怡教授、杨雪燕教授、韦艳教授，研究生刘利鸽、张群林、杨博、李卫东、李静也参与了个别章节的研究工作。在朱正威教授承担的研究工作中，西安交通大学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郭雪松副教授，硕士生胡永涛、薛婷婷作为其团队成员也做出了很大贡献。在此对他们的工作和支持表示诚挚的谢意。具体章节撰写情况如下。

张群林、杨博、杨雪燕：第二章第四部分大龄未婚男性与风险性行为的研究；

薛婷婷：第二章第五部分大龄未婚男性流动人口与公共安全的研究；

靳小怡、刘利鸽：第三章第二部分性别失衡社会风险与行为失范的宏观识别；

韦艳、李静、李卫东：第三章第三部分性别失衡下相关利益群体的中微观失范研究；

胡永涛、郭雪松：第五章性别失衡社会风险传导与突变机制的研究。

目 录

绪 论	1
-----------	---

第一篇 基础研究：性别失衡及其社会风险

第一章 当代中国人口性别结构的演变	17
一 引言	17
二 人口性别结构的动态演变	18
三 人口性别结构变动的驱动因素	21
四 人口性别结构的驱动因素分解	25
五 小结	29
第二章 性别失衡下的人口健康与公共安全	31
一 引言	31
二 国际视野与历史经验	32
三 现实探索性发现：婚姻与心理福利	42
四 现实探索性发现：大龄未婚男性与风险性行为	57
五 现实探索性发现：大龄未婚男性流动人口与公共安全	73
第三章 性别失衡社会风险的系统识别	95
一 引言	95
二 性别失衡下宏观社会风险的系统识别	97
三 性别失衡下中微观失范风险的识别	105
四 性别失衡下宏观和中微观社会风险的系统总结	124

第二篇 机制研究：性别失衡社会风险的传导放大

第四章 性别失衡社会风险的放大机制	131
一 引言	131

二 性别失衡社会风险放大的机制模型	133
三 性别失衡背景下的人口流动与艾滋病传播风险的放大	143
四 小结	155
第五章 性别失衡社会风险的传导与突变机制	157
一 引言	157
二 性别失衡社会风险的传导机制	159
三 性别失衡社会风险的突变机制	178
四 小结	191

第三篇 对策研究：性别失衡及其社会风险的治理

第六章 性别失衡及其社会风险治理的理论基础	195
一 社会变迁中性别失衡的理论阐释	195
二 性别失衡及其社会风险治理理论	203
第七章 性别失衡议题的讨论与政策博弈	211
一 性别失衡议题背后的多元利益格局与政策博弈	211
二 性别结构失衡的出路：发展还是治理	223
第八章 性别失衡社会风险的阻断与治理	233
一 性别失衡社会风险的治理思路	233
二 性别失衡社会风险放大途径的阻断与治理思路	238
参考文献	244
索引	273

Contents

Introduction / 1

Part One Basic Research: Gender Imbalance and Social Risk

Chapter One The Evolution of Gender Structure of Population in China / 17

- 1 Introduction / 17
- 2 Evolution of Population Gender Structure / 18
- 3 Driving Factors for Change of Gender Structure / 21
- 4 Decomposition of Driving Factors / 25
- 5 Summary / 29

Chapter Two Population Health and Public Security / 31

- 1 Introduction / 31
- 2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 and Historical Experience / 32
- 3 Findings from Exploring Study: Marriage and Psychological Well – being / 42
- 4 Findings from Exploring Study: Forced Bechalors and Risky Sexual Behavior / 57
- 5 Findings from Exploring Study: Migrating Forced Bechalors and Security / 73

Chapter Three Identifying Social Risks of Gender Imbalance / 95

- 1 Introduction / 95
- 2 Identifying Social Risks of Gender Imbalance at Macro – level / 97
- 3 Identifying Social Risks of Gender Imbalance at Micro – level / 105
- 4 The Relationship of Social Risks Between Macro – level and Micro – level / 124

Part Two Social Risk Spread and Implication

Chapter Four Social Risk Implication of Gender Imbalance / 131

- 1 Introduction / 131
- 2 The Model of Social Risk Implication of Gender Imbalance / 133
- 3 Migration and HIV Transmission Risk under Gender Imbalance Society / 143
- 4 Summary / 155

Chapter Five Social Risk Spread and Mutation / 157

- 1 Introduction / 157
- 2 Social Risk Spread of Gender Imbalance / 159
- 3 Social Risk Mutation of Gender Imbalance / 178
- 4 Summary / 191

Part Three Gender Imbalance and Social Risk Intervention

Chapter Six Theoretical Basis for Intervention / 195

- 1 Theoretical Explanation for Imbalance of Sex Ratio at Birth / 195
- 2 Theories for Intervention of Gender Imbalance and Social Risk / 203

Chapter Seven Argument and Policy Game Regarding Gender Imbalance Issues / 211

- 1 Pattern of Diversified Interests and Policy Game behind Gender Imbalance / 211
- 2 The Way Out for Gender Imbalance: Development or Intervention / 223

Chapter Eight Social Risk Block and Intervention / 233

- 1 Social Risk Intervention / 233
- 2 Block and Intervention of Social Risk Implication / 238

Reference / 244

Index / 273

绪 论

一 问题的提出

(一) 转型社会人口性别结构失衡问题的爆发

进入 21 世纪,中国的人口问题变得错综复杂,已经由过去单纯控制人口数量转变为统筹解决人口数量、质量、结构、分布和流动等一系列问题。其中,结构性问题之一在于人口性别结构的失衡。性别结构是指男性人口与女性人口的比值,或者说平均 100 个女性人口所对应的男性人口数量。由于在正常情况下,男性在整个生命周期中的死亡率高于女性,因此大多数国家的女性人口略多于男性,总人口性别比的正常值应该基本等于或低于 100。一旦偏离这一正常值,则被认为人口性别结构失衡,简称性别失衡。出生、死亡和迁移因素的性别差异都会影响人口性别比。其中,中国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持续大范围的出生性别比偏高,是导致中国目前人口性别结构严重失衡的关键因素。出生性别比是指每 100 名活产女婴对应的活产男婴的数量。根据世界各国的经验,在没有人干预的情况下,出生性别比的正常范围是 103~107。但中国自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以来,在低生育率背景下,出生人口性别比持续攀高,严重偏离了正常范围。根据之后的历次人口普查和人口 1% 抽样调查数据,全国的出生人口性别比从 1981 年的 108.5 持续攀升到 2005 年的 119。尽管 2010 年回落到 118,但仍保持在高位。国家统计局的数据也显示,出生性别比从 2006 年的 119.25 上升到 2008 年的 120.56,达到峰值。之后持续下降,在 2009 年和 2010 年快速下降到 119.45 和 117.94,但从 2011 年(117.78)和 2012 年(117.70)来看,出生性别比下降速度趋缓,仍保持在高位。而且,中国的出生性别比偏高这个问题的波及范围越来越广。普查数据显示,1982 年中国尚有一半的省、市、自治区的出生人口性别比在 107 以内;1990 年

这一数字则缩减为 1/3；到了 2000 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时，全国 31 个省、市、自治区中只有 3 个省区（西藏、新疆和贵州）的出生人口性别比处于正常范围，个别省份的出生人口性别比甚至超过 130。全国范围内出生性别比的持续偏高，严重违背了性别结构平衡的自然法则。除了偏高的出生性别比，中国也存在偏高的女性婴幼儿死亡水平（Li 和 Sun，2003）。通常情况下，生物学因素是决定男女死亡性别差异的最主要因素，男性婴幼儿死亡水平高于女性婴幼儿的死亡水平。然而，我国 1~4 岁年龄段的女性死亡率要比男性死亡率高 10%，在高胎次的儿童中这一差异更加明显，达到 15%（Choe 等，1995）。偏高的女孩死亡水平甚至极端情况下的溺弃女婴现象，进一步加剧了人口性别结构的失衡。

出生性别比或者死亡率性别比偏离正常水平，必然会导致某一性别人口的绝对数量出现“过剩”，导致性别失衡。据估计，中国 20 世纪女性缺失 3559 万人，占所考察队列人数的 4.65%（姜全保等，2005）。这意味着中国将有 3000 多万名男性出现过剩。性别失衡导致的女性缺失现象必然会造成男性“婚姻挤压”，每年将有数以百万的年轻男性在本国找不到异性成婚（Das Gupta 和 Li，1999）。根据测算，中国严重的男性婚姻挤压自 2000 年开始，2013 年之后每年的男性过剩人口将在 10% 以上，2015~2045 年可能达到 15% 以上，平均每年约有 120 万名男性在婚姻市场找不到初婚对象（李树茁等，2006）。虽然出生人口性别比长期失衡的累积效应才初露端倪，对于大规模人口性别结构失衡所带来的问题，还没有人能真正判断它的后果会严重到何种程度，但在中国目前的婚配制度下，女性缺失引起中国人口性别结构失衡，必将导致适龄男性在进入婚姻市场后面临婚姻挤压问题。而且，中国目前正处于由经济体制改革触发的社会转型期，社会竞争的加剧导致一大批竞争失利者成为社会弱势群体，而收入差距的拉大也加剧了社会的矛盾和冲突。因此，这些受到婚姻挤压而成婚困难的男性往往也是社会底层的弱势群体。2000 年的普查数据显示，受教育程度在初中及以下、年龄为 30~49 岁的人口未婚人口性别比高达 1000 以上，这意味着未婚男性人数是未婚女性人数的 10 倍以上。另外，改革开放以来，人口大规模流动的趋势也将在性别结构失衡的社会环境下，加大女性婚姻迁移和流动的比重，由此导致男性婚姻挤压现象高度集中在偏远落后的农村地区，使得城乡、区域间的性别失衡态势更加复杂和严重。因

此，中国的人口性别结构失衡下男性过剩对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乃至对国际安全的影响已经引起了广泛关注（Hudson 和 Den Boer, 2004；Edlund 等，2007；Ebenstein 和 Sharygin, 2009；Das Gupta 等，2010）。

（二）性别结构失衡或将引发和放大一系列社会风险

中国由出生性别比偏高和女孩死亡水平偏高带来的性别结构失衡，将对中国的可持续发展乃至全球的稳定与和谐发展造成什么样的冲击和影响，虽然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广泛关注，但由于性别失衡所引发的社会风险还未完全显现，再加上导致中国性别失衡的原因复杂多样，社会转型期的各种社会矛盾又进一步加剧了性别失衡及其社会风险的复杂性，因此政府与社会对性别失衡所引发的各种潜在社会风险普遍缺乏清晰的认识。但首先可以肯定的是，人口性别结构的失衡在宏观上必将对中国的人口规模、人口老龄化、劳动适龄人口、婚姻市场等人口问题产生长期的影响。在微观上也必将导致受到婚姻挤压而无法成婚的大龄未婚男性无法享受到婚姻家庭所带来的各种社会和心理福利。在中国家国同构的文化传统下，家庭是组成和维持社会正常运转的基础，而婚姻是组建家庭的必然环节。而且，受儒家香火延续和传宗接代思想的影响，家庭承担着宗族延续和制度文化传承的责任，此外婚姻家庭作为最重要的社会支持和社会联系纽带，也是获取社会认同和发展社会关系网络的基础。因此，陷入成婚困境的男性不仅自身的生理需求难以得到满足，生活质量下降，而且将不可避免地遭受香火延续的压力和被社会孤立、污名化的压力。在中国社会保障体系尚不健全、农村以家庭养老为主的情况下，未来大量单身家庭的出现将引发养老危机。

中国性别结构失衡之所以引发了广泛的关注，是因为专家学者们基于历史经验判断，其后果绝不局限于人口领域或局限于被婚姻挤压的这些男性。在世界范围内，未婚成年男性产生暴力行为的比例高于已婚男性（Hudson 和 Den Boer, 2004），未婚成年男性数量越大，反社会行为就越多（韦艳等，2005）。因此，有专家指出，在男性大大多于女性的格局中，男性之间为了争夺资源和利益，随时可能爆发社会冲突与暴力事件，破坏正常的伦理秩序，损害社会和谐、稳定和可持续发展（Hudson 和 Den Boer, 2004）。而且，高性别比的社会通常性产业发达，性别失衡产生的大量未

婚成年男性会自发形成性需求市场，使性交易和性服务社会化（孙江辉，2006）。这可能会带来一系列社会问题，如卖淫嫖娼现象增加、多重性关系出现、性行为错乱甚至发生拐卖人口等事件，形成对社会伦理道德体系的冲击，威胁传统婚姻家庭的观念与形式，影响社会稳定，也影响经济发展。国外甚至有学者将男性“过剩”问题与国际安全相联系，认为“光棍”阶层的出现将令犯罪率上升，使艾滋病和性病大规模爆发，给国际安全带来威胁（Hudson 和 Den Boer，2004）。因此，弱势群体利益的持续受损不但损害了可持续发展中人的全面发展这一核心理念，而且其最终积累的不安全、不稳定因素也会对整体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造成负面影响（朱力，2002）。

在中国社会转型背景下，性别失衡及与之相关的人口和社会问题与各种社会矛盾冲突共生并相互作用，变得更加严重和复杂。由于中国的社会保障制度、户籍制度、就业制度等社会制度不完善，相关领域公共政策缺失与滞后以及城乡与区域差距不断拉大，因此各种社会矛盾、冲突不断涌现，催生了新的弱势群体并加剧了原有弱势群体的脆弱性。作为基础风险，以性别失衡为核心的人口安全问题可能将激化并放大其他社会问题，而庞大的人口规模将加大公共治理的难度、削弱财政支持的力度。性别失衡也可能加剧社会保障制度缺失条件下大龄未婚男性群体的养老困难，可能会激化并放大买婚、拐卖妇女、非婚生育、卖淫、性侵犯、暴力犯罪等社会问题，进而影响公共安全。在中国经济发展城乡与区域极度不平衡的情况下，这些社会问题往往发生在偏远落后的农村地区，治理这些社会问题所需的财政支持也往往杯水车薪，一旦这些社会问题积聚并形成规模，就可能对公共安全和社会稳定产生不可估量的负面影响。因此，在中国各种社会制度不完善及各种社会矛盾冲突不断涌现的条件下，性别失衡及与之相关的人口和社会问题不仅损害女性的生存与发展权，而且将对不同群体产生负面影响，进而损害到社会所有人群的整体福利，并可能对人口、经济、社会、文化、公共健康等公共安全产生影响，阻碍和谐社会的构建和社会稳定。

国内外对中国性别失衡的研究最初较多地集中于原因和态势方面，近年来逐步转到对性别失衡后果的研究上。已有的关于性别失衡后果的研究虽然较为全面，但都是简单的宏观方面的推导或个别的微观调